



# 两出惊人相似的悲剧：论岳飞与于谦之死

李建国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陕西西安 710100)

**摘要:**岳飞和于谦是中国历史上两个著名的英雄人物,同时又都是以悲剧而收场。笔者通过考察造成两人悲剧的根源,竟然发现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两人之死皆既与当时微妙而错综复杂的皇室内部矛盾紧密相关,也与自身的性格等因素有很大的关系。

**关键词:**悲剧;皇室矛盾;性格

**中图分类号:** K245;K2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70X(2016)06-0101-05

**PDF获取:** <http://sxxqsfxy.ijournal.cn/ch/index.aspx>

**doi:** 10.11995/j.issn.2095-770X.2016.06.023

## A Study of Two Similar Tragedies: The Death of Yue Fei and Yu Qian

LI Jian-guo

(Shaanxi Xueqian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00, China)

**Abstract:** Yue Fei and Yu Qian are both famous heroes in Chinese history. They were all died by political tragedy. The reasons of the two tragedies are very similar. They were all killed because of the complex conflicts in the palace and the defects in their personalities.

**Key words:** tragedy; the conflict in the palace; personality

岳飞和于谦是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的两位英雄,两人都是含冤而死,死后皆葬在杭州西湖之滨,与明末清初抗清英雄张苍水(张煌言)号称“西湖三杰”。清人袁枚《谒岳王墓》诗云:“江山也要伟人扶,神化丹青即画图。赖有岳于双少保(岳飞、于谦均曾因功授少保衔),人间始觉重西湖”,对二人极为推崇。几百年来,人们提起两人的悲剧,无不扼腕叹息。然而,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两人的死因就会发现,竟有颇多相似之处。除了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和奸人陷害以外,两人性格上的缺陷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 一、皇室内部的复杂关系与岳飞、于谦面临之困局

北宋末年的“靖康之难”使得原本平稳的赵宋皇

室内部关系突然复杂化。

“靖康之难”中,太上皇宋徽宗、当朝皇帝宋钦宗和宗室诸王都作了俘虏,后来被带往金国,只有康王赵构因被派往金营议和不达而得以幸免。在这种非常的情况下,原本与皇位无缘的赵构竟然登基做了皇帝。

赵构是宋徽宗的庶子,排行第九,其母韦氏亦地位低微,本来他与权力中心有着相当的距离,根本没有做皇帝的机会,因此皇位对他来说如同天上掉下的馅饼。喜出望外之际,他必然对得来不易的皇位如获至宝,极力加以维护,这就使得他对父兄即徽、钦二帝的感情、态度十分复杂、微妙。

从人情上讲,他对父兄当然非常挂念,也希望他们能早日平安归来;从封建伦理道德来讲,孝、悌乃人之大伦,在崇尚“修身为人”之道的理学已经兴起

**收稿日期:** 2015-09-24; **修回日期:** 2016-01-05

**作者简介:** 李建国,男,陕西大荔人,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宋明史)和中国文化史。

的宋代,赵构自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拒绝迎回二宫;从当时的局势来看,也有不得已的理由。南宋虽然已经建立,但政权很不稳定,金兵不断南下,必欲灭亡南宋而后快,根本不承认它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迎二圣、复故土”就成了号召抗金的最好旗帜和招牌。高宗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恰好可以加以利用。一旦形势缓和,高宗的抗金热情马上大减,态度趋于消极,对岳飞诸将的行动严加约束,原因就在于他担心金国如若抵挡不住,就有可能将徽、钦二帝放回,到那个时候,自己的皇位怎么能保住?所以徽宗一直到客死异域后梓宫才得以返国。尽管钦宗后来一再声称自己回国后绝没有复位的想法,但高宗还是不放心的。这不是杞人忧天,建炎三年苗、刘之变时苗傅就言称“帝不当即大位,渊圣(即钦宗)来归,何以处也?”<sup>[1]</sup>

高宗这种复杂而矛盾的心理在明文征明《满江红·题杭州岳庙》的词里反映得淋漓尽致:“岂不惜,中原蹙,岂不念,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彼区区一桀亦何能,逢其欲。”因此可以说,“迎二圣”只是宋高宗的表面文章,是他可以随时打出的一张牌,可岳飞偏偏难以理解这些,他一腔热血,赤心报国,力主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抵抗强敌,“直抵黄龙”,迎回二圣。高宗刚一即位,岳飞就曾上书数千言,希望高宗“乘敌穴未固,亲率六军北渡”<sup>[1]</sup>,恢复中原,结果以越职被免官。后来,面对岳飞增兵北伐、一举收复失地的要求,高宗的回答很干脆:“宁与减地分,不可添兵”<sup>[2]</sup>。高宗对岳飞所为颇不以为然,又不便明言,为此十分恼怒。这样一来,岳飞自然没有好下场。

“立储”是另一个导致高宗和岳飞关系紧张的因素。高宗中年以后,因没有子息,所以立储成了关系国家稳定的大问题。从人情上讲,高宗当然希望皇位由自己的儿子继承,而不希望传给外人,所以皇储问题成了高宗心头的隐痛,十分敏感。群臣都清楚这一点,大都装聋作哑,不愿提及。而岳飞虽为武将,但认为这个问题事关国本,因此不顾自身安危,大胆建言立皇储。高宗为此很不高兴,曾教训岳飞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预”<sup>[2]</sup>,不应越职干预朝政。高宗对于此事的反应并非过于敏感,苗、刘之乱时叛将就曾提出高宗逊位、立皇太子为君的要求。按照“重文抑武”的祖宗家法,高宗防微杜渐,实在是合理的。

所以,杀岳飞也是南宋朝廷收兵权、加强对将领控制的手段。因为当时已经出现了武人拥兵自重的

端倪。“众军相呼,必曰某姓某家之兵”<sup>[3]</sup>。因此,汪藻提醒高宗说“幸今诸将皆齷齪常才,固不足深忌,万一有如韩信者,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岳飞报国心切,在不知不觉中又犯了大忌。“艰难之时,陛下欲得其心,姑与之无间”<sup>[3]</sup>,一旦南宋朝廷稳定下来,高宗便将屠刀挥向了岳飞。

明中叶正统、景泰之际的于谦面临着同样的困局。

正统十四年英宗亲征时,命皇弟郕王留守京师。土木之变发生后,朝廷一片混乱。皇太后孙氏(明宣宗皇后,英宗立,尊为皇太后。宣宗临崩,“遗诏大事白皇太后行”<sup>[4]</sup>,其在正统、景德间的地位和影响可想而知)遂命立英宗朱祁镇子见深为皇太子。因太子年幼,又命郕王朱祁钰监国。英宗朱祁镇与郕王朱祁钰虽是兄弟,并非一母所生,而孙太后作为英宗的母亲(虽非亲生,但外人及英宗本人均不知。《明史》载其“无子,阴取宫人子为己子,即英宗也……而英宗生母,人卒无知之者”<sup>[4]</sup>),从人情上讲,她当然希望皇位能由英宗保持,即使英宗不能回朝,她也希望皇位能由英宗之子继承。

一个月后,郕王即皇帝位,遥尊英宗为太上皇帝,以明年为景泰元年。此时,英宗之子朱见深仍为皇太子。对于这种结果,孙太后虽勉强接受,但并不满意。她在后来的一封制谕中曾斥责郕王“性本枭雄,遽据天位”<sup>[5]</sup>。据说英宗在得知这种措置后却表示赞成,“闻之喜”<sup>[5]</sup>。

然而,景泰三年五月,景帝废皇太子见深为沂王,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皇太子。这必然引起孙太后和太上皇朱祁镇的不满。虽然皇太子朱见济不久就病死了,但景帝一直拒绝恢复见深的皇太子之位。这就埋下了后来“夺门之变”的伏笔。

英宗返国后,被幽禁在皇城南宫。以景帝待太上皇之薄,孙太后的怨愤之情可想而知,而英宗南宫复辟,事先也确实得到她的同意,“石亨等谋夺门,先密白太后。许之”<sup>[4]</sup>。以太后当时的地位和影响力,朱祁镇要想复辟,不取得她的支持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

在这种复杂的局势下,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于谦当时的处境及他可能采取的对策。土木之变后,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秋,他冷静地建议皇太后以郕王监国,并劝说郕王接受:“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sup>[4]</sup>。然而,陷在敌手的英宗给于谦出了一道难题。在面对也先的要挟时,于谦主张“社稷为重,君为轻”,顶住压力,坚持抗敌。这种态度却得罪了英

宗，并因此招来杀身之祸。史载，因谦“始终不主和议，虽上皇实以是得还，不快也”<sup>[4]</sup>。明人何乔远曾说过：“上皇车驾至城下，于谦主战不纳，欲求无诛，岂可得乎？”<sup>[6]</sup>，确实是非常有见地的。

当景帝废立皇太子之时，于谦并没有激烈反对，最后接受了事实，这也成为他后来被杀的理由之一。其实，以于谦当时之地位，他很难说服景帝改变主意。时人唐枢即认为“以景皇之锐念，不可以口舌争”。王世贞也以为“景帝之信谦，谓其能御围，非有布衣腹心素……夫人主以私爱欲易太子，虽留侯不能得之汉高，而谦能得之景帝乎哉？”<sup>[6]</sup>真实地道出了于谦当时面临的困境。

## 二、功高才显，品格高洁——遭人嫉恨之根源

岳飞和于谦虽然相隔数百年，一文一武，但都才华横溢、功高盖世。

岳飞虽出身行伍，位居大将，然“好贤礼士，览经史，雅歌投壶，恂恂如书生”<sup>[1]</sup>。其书法笔势纵横，豪放不羁，诗词亦颇为可观（如著名的《满江红》一首）。宗泽就曾称赞岳飞“勇智才艺，古良将不能过”<sup>[1]</sup>。《宋史·岳飞传》论曰：“西汉而下，若韩、彭、绛、灌之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

岳飞不但有雄才大略，而且尽心尽力于国家，功满天下。可以说，南宋初年局面的稳定，与岳飞有很大的关系，但因为他在中兴诸将中年龄最小，资历最浅，反而引起了他们特别是张俊的忌妒。“初，飞在诸将中年龄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显功，世忠、俊不能平”<sup>[1]</sup>。后来，金军攻打淮西，该地本来由张俊负责防守，他却胆怯不敢出战。岳飞闻命即行，遂大破敌军，解当地之围，朝廷授岳飞两镇节，“俊益耻”<sup>[1]</sup>。为了缓和与诸将的紧张关系，岳飞在平定杨么起义后，献给张俊、韩世忠缴获的楼船各一艘，兵械齐备，“世忠大悦，俊反忌之”<sup>[1]</sup>。张俊后来与秦桧等人勾结起来陷害岳飞，嫉妒心作祟是重要的原因。

而作为景泰年间的名臣，于谦也是才气逼人。他虽然是进士出身，位列文臣，但却留心军事，胆略果敢不输于武臣，可谓文武兼备。“当军马倥偬，变在俄顷，谦目视指屈，口具章奏，悉合机宜。僚吏受成，相顾骇服……其才略开敏，精神周至，一时无与比”<sup>[4]</sup>。《明实录》也载，谦“英迈过人……学问该博，善诗文，尤长于奏疏。政务旁午，章日数十上，累千万言，挥笔立就”<sup>[5]</sup>。

“土木之变”发生后，于谦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可以说对明王朝有再造之功，故而深受景帝重用，官高爵显。这不可避免地遭到一些人的嫉妒，“由是诸不任职者皆怨，而用弗如谦者，亦往往嫉之”<sup>[4]</sup>。也先刚被打退，都御史罗通即弹劾于谦所上功簿不实：“向者德胜等门外不知斩馘几何，而获官者至六万六千余人……若今腰玉珥貂，皆苟全性命保爵禄之人，憎贤忌才，能言而不能行，未足与议也。”大将石亨之所以对于谦不满，也是因为与于谦共事时，“谦论议断制，宿将叹伏，而亨不能赞一辞，衔之”<sup>[5]</sup>。后来，石亨联合其他人发动夺门之变，拥英宗复位，随即唆使言官陷于谦于死罪，以发泄心中的忌恨。

岳飞、于谦二人不仅才显功高，而且都志向远大，品行高洁。

首先，两人都不贪财货，淡于私利。

高宗要为岳飞营建府第，岳飞坚决推辞：“敌未灭，何以家为？”朝廷凡有犒赏，“均给军吏，秋毫不私。”<sup>[1]</sup>故他家的田产远少于韩世忠、刘光世等人，更不及张俊。

于谦为官不贪不贿。正统年间，宦官王振专权，百官大臣争相献金求媚。于谦进京奏事时，有人劝他送些当地的土特产，他笑着甩了甩两只袖子说：“只有清风”。他还特意写了《入京》诗以明志：“绢帕麻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成语“两袖清风”就是这样来的。他不事田宅，多次拒绝朝廷的封赏。北京保卫战胜利后，论功行赏，加于谦少保衔，总督军务，于谦固辞：“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耻也，敢邀功赏哉！”。因为于谦的居所简陋，景帝特在西华门赐给他一所府第，于谦也坚决拒绝：“国家多难，臣子何敢自安。”<sup>[4]</sup>实在推辞不掉，他也从来没去住过，只把景帝赏赐的东西保存在里面，每年去看一看而已。到了于谦获罪朝廷籍没其家时，“家无余资”<sup>[4]</sup>。

其次，两人都不好酒色，生活俭朴，不追求物质享受。

岳飞家素无姬侍。名将吴玠一直佩服岳飞，想和他交好，于是就送给他一个有名的美女，被他当场拒绝：“主上宵旰，岂大将安乐时？”结果吴玠对他更加敬服。岳飞年轻时本来颇能饮酒，有一次高宗劝戒他说：“卿异时到河朔，乃可饮”<sup>[1]</sup>，从此他就滴酒不沾。

于谦素来“自奉俭约”，不以为意，情况紧急时就住在直庐，连家也不回。景帝听说他顾不上照顾自己，“服用过薄”<sup>[4]</sup>，就下令宫中制赐，甚至于连蔬菜

和酱醋等调料也一应俱全。他不到五十岁就丧妻，从此不再续娶，一心朝廷。

再次，两人皆忧国忧民，奋不顾身。真正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有人问岳飞天下何时太平，他义正词严地回答说：“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sup>[1]</sup>岳飞半生戎马疆场，经历大战无数，出生入死，从不畏避退缩，连敌人也哀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只要有利于国家、天下，他不避嫌怨，当言则言，即使得罪皇帝、权臣亦在所不惜。

《明史》载于谦“至性过人，忧国忘身”<sup>[4]</sup>。“土木之变”后，在也先利用明英宗要挟明朝的时候，于谦不为所动，断然拒绝，因此必然会开罪英宗，后果难以预料。后来，也先见勒索无效，明英宗留在手里已没有任何用处，就想放他回国。大臣王直等建议遣使奉迎，景帝很不高兴地说：“朕本不欲登大位，当时见推，实出卿等。”<sup>[4]</sup>不想让英宗回来，担心他回来后关系不好处。最后还是于谦力排众议，并说服景帝改变了主意。可以说除了于谦，当时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于谦已经与英宗有隙，他回来后难免对自己不利。于谦虽然明白这一点，但为了大明王朝的江山社稷，他毅然将个人的安危生死置之度外。（其实，他早年的明志诗《石灰吟》就已经将他这种精神境界展示无遗：“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顾，要留清白在人间。”）

由于以上这些原因，使得他们在当时的朝廷上显得比较孤立、无助。

### 三、性格因素与对立面的形成

岳飞、于谦悲剧的形成，除了上面所说的客观因素之外，和他们本人也有直接的关系。二人性格中都有些缺陷，如过直过激，不容人过，致使他们与同僚的关系紧张，甚至最终将一些人推向对立面。

如宰相秦桧一直力主与金议和，然而岳飞不但不附和，反而认为“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指责秦桧“谋国不臧，恐贻后世”，桧“衔之”<sup>[1]</sup>。杨么起义被平定后，因为募民营田、屯田成效显著，高宗亲书曹操、诸葛亮、羊祜三人事迹赐岳飞。岳飞跋其后，“独指操为奸贼而鄙之”，秦桧认为是在影射他，故此“尤桧所恶也”。<sup>[1]</sup>

张俊与岳飞同为节镇，两人关系本来就紧张，一次他们奉命共同巡行楚州城，张俊欲修城为备，立即遭到岳飞的当面痛斥：“当戮力以图恢复，岂可为退保计？”张俊未曾料想岳飞有如此反应，当时就“变

色”。<sup>[1]</sup>

又如万俟卨任提点湖北刑狱时，岳飞奉旨宣抚荆湖，因为鄙薄万俟卨的为人，“遇卨不以礼，卨憾之”<sup>[1]</sup>。后来这三个人联起手来对付岳飞，和他本人有很大的关系。

甚至对于宋高宗岳飞有时也意气用事，不顾龙颜。绍兴七年高宗本来已答应将王德、郾琼所部隶属岳飞指挥，但由于秦桧主和，遂推翻了这个决定。岳飞一气之下，即日上章请求解除他的兵权，终母亲之丧，并不待高宗答复，以张宪摄军事，步行归第，在母亲墓侧结庐守制。高宗多次下诏催促他还职，他力辞不受。高宗没有办法，只好下令岳飞幕属抵草庐以死相请，双方僵直了六天，岳飞才赴朝请罪。这已经迹近要挟。高宗虽“尉遣之”<sup>[1]</sup>，但心里不高兴是可想而知的。到了第二年，高宗以金国通好、归还河南故地并许还徽宗梓宫大赦，授岳飞开府仪同三司，岳飞坚决推辞，声言：“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可训兵飭士，谨备不虞，而不可论功行赏，取笑敌人。”<sup>[1]</sup>三诏不受，后来还是在高宗温言劝谕下，才勉强接受。不管高宗是否自欺欺人，总之他当时正在兴头上，谁知岳飞“不识相”，一下子掀掉了遮羞布，露出了他的疮疤，难保高宗不怀恨在心。

《宋史》即认为岳飞“忠愤激烈，议论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祸”<sup>[1]</sup>，颇有道理。

于谦亦“性故刚”<sup>[4]</sup>，待人严苛。如发现官员有过错，就当面斥责，丝毫不留情面。“虽勋臣宿将小不中律，即请旨切责”<sup>[4]</sup>，不给转圜的余地。

大将石亨本以于谦荐举而得重用。北京保卫战获胜后，石亨因守卫德胜门之功被进封侯爵。他觉得于谦的功劳在他之上而没有封侯，心里不安。于是就向朝廷举荐于谦的儿子于冕，谁知被于谦拒绝。于谦还上书景帝斥责石亨：“国家多事，臣子义不得顾私恩。且亨位大将，不闻举一幽隐，拔一行伍微贱，以裨军国，而独荐臣子，于公议得乎？”石亨“大恚”<sup>[4]</sup>，结果两人由并肩作战的战友变成仇敌。

又如王伟由于谦荐至兵部右侍郎，他看到于谦在朝廷树敌太多，就有意与于谦拉开距离，并向景帝密奏于谦的过失。景帝把他的奏疏交给于谦看，谁知于谦一下朝就讥笑王伟：“我有失，望君面规我，何至尔邪？”并将奏疏拿出来给他看，结果“伟大惭愧”<sup>[4]</sup>。其实，这种做法既出卖了景帝，又人为地加深了王伟对他的仇视，实在是不明智之举。

此外，徐瑄（后改名徐有贞）对于谦“切齿”<sup>[4]</sup>痛恨，并最终成为夺门之变的主谋人，将其送上断头

台,也和于谦的处理不当有很大关系。

故而《明实录》评于谦“恃才自用,矜己傲物,视勋旧国戚若婴稚,士类无当其意者,是以事机阴发,卒得奇祸”<sup>[5]</sup>,可谓一针见血。

### 四、二人被杀的最后机缘——可悲的牺牲品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造成岳飞、于谦两出悲剧的根源极为相似,就连促使统治者最后下决心杀死二人的契机也颇为类同。

绍兴十一年,宋高宗再次得知与金国议和的可能性,金人的条件是杀岳飞。(当时兀术在给秦桧的信中明确提出:“汝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必杀飞,始可和。”<sup>[1]</sup>)以杀岳飞换取对金议和,他是不会有什么犹豫的,甚至可说是正中下怀的。

而景泰八年正月南宫复辟后,明英宗下令都御史萧惟贞负责审理于谦的案子,惟贞坐以谋逆罪,处极刑。奏上,英宗还有些犹豫,认为“于谦实有功”。然而徐有贞提醒他说:“不杀于谦,此举(指夺门之

变)为无名”<sup>[4]</sup>,意思是由于谦来承担这次政变的责任。他们诬陷于谦与黄竑等构邪议,更立东宫,又与太监王诚、舒良、张永、王勤等谋迎立襄王子,说这样才逼得太上皇复出收拾局面,这就为政变提供了一个最好的借口和理由。如此一来,英宗的心意遂决。

于是,两位擎天立柱式的英雄就这样沦为某种政治需要的可悲的牺牲品。

#### [参考文献]

[1] 脱脱.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2] 李心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56.

[3] 徐梦莘. 三朝北盟会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4] 张廷玉. 明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5] 明实录[M].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据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抄本影印本.

[6] 谈迁. 国榷[M]. 北京:中华书局,1958.

[责任编辑 李兆平]

(上接第 77 页)

由于他们来自偏远地区,所以狼土兵们的汉化程度都不高,导致他们把本地区形成的恶习带到沿海地区,比如抢劫百姓、滥杀无辜等现象就时有发生。对于调动狼土兵朝中争议一向都很大,如王守仁就说过“狼兵所过,不减于盗。”<sup>[10]</sup>卷9,别录一,奏疏一 在嘉靖三十五年十二月,“永顺、保靖二宣慰司兵,自浙江平寇还,骄甚,无复纪律,所过肆掠,民缘江上下多被焚劫者”<sup>[1]</sup>卷442,嘉靖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条。御史屠仲律听说了以后要求严惩土官彭荃臣、彭翼南,兵部复议后认为他们刚立下战功,不适合惩戒,“恐孤远人效劳之意”<sup>[1]</sup>卷442,嘉靖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条,不得已只惩罚了带头作乱的小头目,同时规定“今后浙直督抚官各遵前旨,团练乡兵御贼,不得轻调客兵”<sup>[1]</sup>卷442,嘉靖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条。由此看出,明朝统治者对狼土兵的使用还是比较谨慎的。

此外,张经的突然被杀,是狼土兵祸害百姓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张经熟悉狼土兵的优缺点,能够把狼土兵放在合适的战略位置,而且狼土兵也是比较信服张经的。张经一死,狼土兵在某些时候便失

去了控制力,其缺点也就显现出来。尽管如此,狼土兵在抗倭史上的影响还是利大于弊,其历史功绩是不容质疑的。

#### [参考文献]

[1] 明世宗实录[M].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2] 张廷玉. 明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3] 董应举. 崇相集选录(附录一)[M]. 日本.

[4] 韦天富. 论广西狼兵在明代沿海抗倭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J]. 广西地方志,2010(5).

[5] 明英宗实录[M].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6] 明太祖实录[M].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7] 明武宗实录[M].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8] 采九德. 倭变事略[M]. 上海书店 1982.

[9] 周清原. 西湖二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10] 王阳明集[M]. 浙江巡抚采进本.

[责任编辑 李兆平]